

共青团与上海青年支援新疆述论 (1963—1966)

易海涛

[摘要] 1963—1966年，上海先后有近10万名青年支援新疆。在此过程中，上海各级共青团组织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动员环节，认真领会上级指示精神，有针对性地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动员工作，并对这些动员工作进行总结反思；在输送环节，各级团组织协同成立了专门的招收机构，并抽调专人做好上海青年的招收、培训和输送管理工作；在安置巩固环节，派出护送干部协助做好青年的安置工作，并为新疆培养了大量优秀青年团干部，还参加了上海赴疆慰问团，为上海青年在新疆的巩固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上海共青团始终以青年为中心开展青年支援新疆的各项工作，与其他部门紧密配合、取长补短，是其工作成功的关键，展现了其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的角色定位。

[关键词] 共青团；上海青年；新疆；上山下乡

[中图分类号] D29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3)06-0034-08

DOI:10.14019/j.cnki.cn31-1856/k.2023.06.002

20世纪50—80年代，先后大约有2000万知识青年（以下简称知青）上山下乡。^[1]总体来看，学界目前对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分期以“文化大革命”为界。1963—1966年，共有近10万名上海青年支援新疆^[2]，约占同时期全国130万上山下乡知青的7.69%。^[3]可见，上海青年支援新疆在“文化大革命”前知青上山下乡进程中有着突出地位。对此，原上海团市委书记张浩波回忆道：“1963年，刚从北京开会回上海的曹荻秋找我去谈话，他告诉我，他在北京时周恩来总理、农垦部部长王震和他三个人一起开了个小会，议论了一件事，要上海每年动员两三万知识青年去支援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每年动员两三万人到新疆兵团去，以改变兵团的状况。对上海来说，每年走两三万青年，也大大减轻了上海的就业压力，对上海的社会秩序、治安、民心都有很大的好处。这个事情定下来后，曹荻秋就对我（当时我还是上海团市委代理书记）说，这个事就交给你们青年团去办。”^[4]确实，上海青年支援新疆有上海城市人口增长、青年安置困难、西北边疆危机等诸多因素，学界对此已有较为丰富的探讨。^[5]

[4]张浩波口述，林升宝、易海涛访谈：《到江西去、到新疆去——张浩波动员青年支援外地工作琐忆》，《青年学报》2018年第1期。

[5]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姚勇：《上海知青在新疆》，新疆大学出版社，2001年；姚勇：《上海知识青年支援新疆建设的历史回顾》，《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易海涛：《社会经济史视野下上海青年支援新疆缘起研究（1962—1966）》，《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年第3期；杜捷、黄金平：《上海知青支援新疆建设》，严爱云主编：《峥嵘岁月：1949—1978》，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2年，第130—140页，等等。

[1]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年）》，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前言。

[2]易海涛：《制造“十万”：1963—1966年上海知青支援新疆的人数与历史记忆》，《安徽史学》2021年第1期。

[3]国务院知青办：《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1962—1979）》，内部资料，1981年，第1页。

但正如张浩波所言，“这个事就交给你们青年团去办”，学界目前已关注到青年团在“文化大革命”前的知青上山下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相关研究也对其作用进行了阐释，但多涉及动员工作，对如何输送、安置、巩固缺乏全面考察。对此，本文拟在各类文献资料和口述访谈的基础上，对上海各级共青团机构组织青年支援新疆的工作进行深入剖析，从而考察共青团在上海青年支援新疆工作中的作用，并对其成功经验进行分析、总结，以期为今天共青团工作提供有益借鉴。

一、前期动员

当上海青年支援新疆的任务确定下来后，张浩波认为，只靠团组织很难完成这么重大的任务。他请求党、团、妇联、街道等协同完成，思想教育、动员工作仍由团做主要工作。^[2]诚如他回顾，在整个动员工作中，上海市劳动局、团市委、妇联等部门联合制定了动员政策，并发布相应的文件和通知，但团的作用又非常突出。

（一）未雨绸缪：对青年的情况进行长期调查。上海团组织与全国各地的团组织一样，在此前就为知青上山下乡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自1962年开始，团在这方面的的工作更为频繁。1962年8月，上海团市委办公室先后通过与街道里弄干部座谈，通过对社会青年^[3]来信的梳理整理并召集社会青年座谈等形式，了解到这一群体的相关情况，计划通过多种形式把社会青年更好地组织起来。^[4]与此同时，团市委地区工作办公室还提供了上海市社会青年的统计信息，为进一步开展社会青年的工作提供依据。统计发现，截至1962年8月，上海共有社会青年

约15万人（其中家庭女青年约8万人，社会闲散知青约7万人）；上海市区各街道、里弄均已建团，全市街道团员共有1.5万人左右，占社会青年总数的10%。^[5]由下而上地展开搜集信息，同时又从上到下进行信息的梳理、传达，在此过程中由上级团组织对下级的统计管理进行指导、监督。如1961年6月，上海市长宁区团委便批评愚园路第三里弄团支部对辖区内的37名社会青年情况掌握不深。^[6]

正是在不断督促下，当上海确定要开展动员青年支援新疆时，上海团市委地区工作办公室便能及时拿出一份对全市15万社会青年较详细的情况说明。这份说明不但对社会青年的概况、类别有详细介绍，同时对团组织的情况、工作现状与改进方向都提供了指引。^[7]此后几年内，以各级团组织的调查统计为基础，结合其他统计材料，使相关宣传动员工作拥有了比较翔实的数据参照。

这些材料不但对人口总数、性别等情况有统计分析，而且对毕业情况、闲散与否、年龄阶段、学历程度、家庭成分、健康状况等方面都有具体统计，这就为动员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统计数据不但包括了社会青年，而且对当年的初高中应届毕业生也有详细的统计分析，甚至针对资产阶级家庭子女也有专门的统计分析。如1963年12月，上海团市委统战部调查发现，全市共有资产阶级子女32万人，其中停学待业、闲居在家的有2万人。^[8]这些长期调查对上海共青团后来开展动员工作提供了直接帮助。

（二）形式多样：开展有针对性的动员工作。在上海青年的动员工作中，包括对现代媒介，如广播电视、报刊等的利用；也有对文艺作品，如电影、音乐等的创作宣传；同时还

[1] 胡献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结构变迁考察》，《中国青年研究》2018年第9期。

[2] 张浩波口述，林升宝、易海涛访谈：《到江西去、到新疆去——张浩波动员青年支援外地工作琐忆》，《青年学报》2018年第1期。

[3] 社会青年指未能继续升学且未得到安置的中小学毕业生。本文所指社会青年、青年等均为知青。一些叙述则保持资料原来的表述。以下不再一一注明。

[4] 《把社会青年组织起来的几种办法》《社会青年的呼声——一次座谈会纪要》，《团的情况》1962年8月9日。

[5] 《街道共青团组织的概况》，《团的情况》1962年8月17日。

[6] 《长宁区愚园路第三里弄委员会37名社会青年的情况调查》，《团的情况》1961年6月30日。

[7] 《街道共青团组织的概况》，《团的情况》1962年8月17日。

[8] 《资产阶级子女的一些情况》，《团的情况》1963年12月23日。

包括如对展览会这一方式的综合利用。这些都对动员上海青年支援新疆起到了激励作用。其中，各级团组织更是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青年的思想教育、典型动员方式、召开动员大会等方面有着明确体现。

一是加强对青年的思想工作。上海各级团组织非常重视青年的思想工作。1963年初，团市委便在上海市委的指示下组织青年学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精神，激发青年奋发图强的革命志气，让其明白国家一穷二白的面貌还没有根本改变，要让青年“决不做杜勒斯所希望的第三代，一定要做无产阶级的接班人”。当时学习的内容很多，仅阶级教育就包括组织青年听苦、访苦、查家史，参观忆苦思甜展览会，回忆对比，等等。总体看来，这些学习教育的内容注重循序渐进，从阶级教育到个人理想的选择等方面加强对青年的教育，同时通过辩论会等形式更加突出宣传青年到新疆去的重要意义。^[1]与此同时，在动员过程中，各级团组织还在组织青年学习雷锋先进事迹的基础上，对青年进行系统教育，为动员参加新疆建设打下思想基础。^[2]

二是采用“滚雪球”的典型形式。所谓“滚雪球”，就是由各级团组织挑选一批团员骨干，通过团校培训后成为整个动员工作的领头羊，然后到各区去进行动员。这其实是各级团组织掌握了骨干，然后利用骨干建立起了一个非正式的权力网络，再利用这种网络来开展相应的动员工作。^[3]首先，由团市委挑选具有代表性、有威信的青年树立为全市的标兵，然后向各区铺开。在此过程中，青年按兴趣爱好等组成各类“群”，由其关键人物带动一批，实践证明成效显著。如1964年，东三里委84名青年中有71人符合动员要求，但一开始只有10人

愿意赴新疆。按此方法动员后，不几天，愿去新疆的青年就增加到20余人。^[4]其次，在串联的方式方法上还采用了“兵对兵，将对将”的形式，即高中生串高中生、初中生串初中生等，如此容易有共同语言，能够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最后，在串联中发现问题、碰到困难，就依靠小组集体研究解决。先集中力量做好青年自身工作，再帮助青年去做家属工作。^[5]日积月累，整个社会渐渐形成一种热烈风气，一些青年在无形中被“串”了起来，主动报名到新疆去。

三是召开各类动员大会。从历年动员上海青年支援新疆的工作来看，各类动员大会的规模越开越大，人数越来越多，青年的参与度越来越高。这既与上海青年支援新疆的形势不断发展有密切关系，更与当时宏观社会环境不可分。1963年6月24日，在上海文化广场首次召开有9000多名青年活动分子参加的动员大会。到1966年5月，上海每年都会召开规模较大的动员大会。市、区开大会，街道、里弄开小会，形成大会与小会相互交织的局面，从而达到会议精神的上传下达。据张浩波回忆，除媒体报道外，动员工作的另一个关键就是做报告，尤其是请领导和代表在大会上做报告。^[6]在1965年的动员计划中就明确要求在当年4月底，上海市、区都要召开动员大会，组织前两年赴疆青年讲演团广泛作巡回报告，掀起动员高潮。^[7]大多数的公开报道都显示大会的动员效果良好，一些初次参加这样隆重大会的青年颇为震撼，因此赴新疆参加建设的决心更加坚决。^[8]

[4]《东三里委“排队分群，突破关键，展开串联，带动一群”的经验》（1964年4月28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21-2-2525。

[5]《共青团上海市委地区部关于1963年动员知青参加新疆建设工作总结和宣传提纲》（1963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21-2-2266。

[6]李开全主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料选辑》第12册，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75页。

[7]《关于1965年动员社会青年参加新疆军垦工作意见和关于召开上海青年下乡上山的参加边疆建设动员大会的通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27-1-883。

[8]《关于下乡上山参加边疆建设动员大会的反映》（1965年5月28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21-1-1095。

[1]《共青团上海市委关于1963年动员知识青年参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工作总结》（1964年2月18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21-2-2266-1。

[2]《关于上海市社会青年参加新疆生产建设情况的汇报》（1963年8月21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27-1-149-1。

[3]冯仕政：《典型：一个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学海》2003年第3期。

(三) 总结反思：不断改进动员工作。总体来看，动员工作的效果很好，大批上海青年的热情被点燃，纷纷要求报名到新疆去。自1963年动员上海青年支援新疆的工作开始后，在短短的两个月中就有4.5万余名青年报名。^[1]之所以有如此效果，与前述的各种因素有直接关系，而另一因素则是宣传中强调到新疆去是培养栽桑养蚕的技术工人，可以享受部队供给制待遇。但这样的宣传存在一定偏差，要求在此后的宣传动员工作中进行纠正。与此同时，动员工作中所存在的其他问题也要进行调整。对此，上海各级团组织不断改进动员工作。

一方面，团中央要求各级团组织不断做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的总结。1963年10月下旬和11月中旬，团中央青农部分别在北京、苏州召开了两个关于动员城市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汇报会，指出：今后，各级团委应有决心把这项工作做好，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强领导。省、市一级团委，应当有一名副书记和一个部门主管这项工作。^[2]上海对上述指示精神做了很好的落实。1964年1月20日，上海团市委地区工作办公室公布了《1964年社会青年工作提纲》，为此后社会青年的工作提供了一份提纲挈领的方案：其一，明确地区工作部门的任务；其二，团的工作要以学校和社会青年工作为重点；其三，充实地区工作部的干部力量（即扩充编制），进一步加强对社会青年的管理，组织开展上山下乡工作，做好社会青年和学校青年的宣传教育工作。^[3]

另一方面，随着动员工作不断推进，上海团市委也不断加强对动员工作的总结。据上海团市委地区工作部发现，在1963年动员工作中，高中毕业生比初中毕业生难动员，书读得越多，越不愿从事体力劳动。因此，在当年的

动员工作总结中，地区工作部就明确指出要从青少年一进学校就教育他们立志做劳动者，要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劳动锻炼，引导他们接触工农群众，培养热爱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养成劳动习惯和吃苦耐劳的作风，而非等到毕业才对学生进行上山下乡教育。此外，还需要加强对社会青年的管理教育工作，把他们组织起来学习政治、文化、技艺，参加体力劳动锻炼和各种社会工作，并开展健康有益的文艺、体育活动，帮助他们从各方面做好上山下乡、参加劳动的准备。^[4]此后，1965年、1966年，上海团市委都在不断总结经验，改进各级团的组织动员工作。

二、组织输送

从上海到新疆千里迢迢，据1963年7月到新疆搜集资料的上海工作人员反映，他们到新疆来回走了18天，其中10天火车、8天汽车。^[5]而绝大多数上海青年在此之前又未曾出过远门，现在平均每年要输送一两万名上海青年到如此遥远的新疆，工作难度可想而知。对此，上海共青团与劳动、教育、交通等部门通力合作，全力做好上海青年的输送工作。其中，共青团在人员的招收、培训，以及旅途日常管理等方面做了大量细致工作。

(一) 建立机构：做好青年的报名、筛选工作。知青上山下乡的动员招收工作，一般是由青年持户口簿到街道办事处报名，并填写参加农业建设志愿书一式二份，然后由街道办事处、派出所和街道团委共同组成审批小组进行审查，并填写审查意见。各街道审查后将志愿书报区，由区与招收单位再审查，并经过目测、体检合格后，由招收单位发给批准通知。一般而言，上海市区的每个街道都会在该街道中心地段设立一个报名站，以方便报名。当青年来到报名站时，报名站会发给登记表一

[1] 《共青团上海市委关于1963年动员知识青年参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工作总结》（1964年2月18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21-2-2266-1。

[2] 《动员城市青年下乡上山工作汇报会议纪要》，《团的情况》1963年12月15日。

[3] 《共青团上海市委地区工作办公室1964年社会青年工作提纲》，《团的情况》1964年1月20日。

[4] 《共青团上海市委地区部关于1963年动员知青参加新疆建设工作总结和宣传提纲》（1963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21-2-2266。

[5] 《塔里木访问汇报大纲》（1963年8月13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26-2-101。

份，由青年当场填写；如果个别要求领表回家填写也可，由工作人员做好记录。收回报名表之后，街道将报名表与政审表合二为一，同时通知青年到指定医院体检，并最终把报名、政审、体检三表合一，会同里弄委员会初审。最终，各街道初审合格的青年交由区与招收单位审查录取，再通过街道里弄组织分批发给青年录取通知书。当被录取青年把户籍关系交给各区工作组以后，即发给军装、杯子等进行编队发给队员证。^[1]在此过程中，各街道也对一些家长反对自己子女报名的情况做出应对，在报名站设有接待室，对家长予以劝说。^[2]

在街道报名工作中，团市委承担着重要任务，尤其是在青年报名材料的筛选环节更是如此。如1965年，上海团市委地区青年工作部在检查徐汇、闸北和南市等区的街道社会青年政审材料时发现，这些地区的社会青年政审材料不严谨、不认真，存在道听途说、无中生有的现象，同时还有随意夸大、不调查就轻下结论、是非不明等情况。因此，地区青年工作部要求各街道要做好政审工作，一方面既要对自己已经政审的材料复查，另一方面在此后的政审工作中要更认真负责，由里弄党支部、团支部等一起填写。^[3]

（二）培养训练：做好出发前的组织、培训等各项准备工作。出发的编队工作主要由各区劳动部门和团组织负责，但任务最终落到各街道，由街道负责具体工作，其中街道团委承担主要任务。以街道为基础分别编为小队、中队，由此组成分队，一个分队大约100人。在编队时便注意骨干力量的合理搭配，对于平时过于顽皮的青年（或品质较差的）分别安插在各个小队，便于提高组织纪律性。不过，对于品德不好但又表示愿意悔改，主动要求到新疆去

的青年，则进行单独编队输送，以保证青年进疆工作顺利开展。^[4]此外，在每批出发的青年中配备一定数量的共青团员，并建立临时团支部。团支部的主要工作是：通过团员和青年积极分子，团结和教育全体队员，保证旅途的纪律和安全。^[5]有条件的小队还建立了团小组，在出发前为团员上一次《团员在行军途中模范作用》的团课，以充分发挥旅途中团的组织作用和团员模范作用。^[6]

关于中小队长的选拔问题，一开始，中小队长的名单由区县劳动局和团委共同研究确定。^[7]后来，主要由团组织协助挑选和配备好小队长和中队长，以便在旅途中真正发挥各级队长的作用，并根据各区分批出发的特点，使后面批次都保留必要的骨干。^[8]总体看来，选拔干部的要求是政治思想好，家庭出身好，群众关系好，作风正派，有一定工作能力。但由于上海有不少资产阶级家庭等出身的子弟，在选拔干部时也照顾到这些青年，如果这些青年表现确实突出，通过街道党委审核后也可任用。^[9]

由区劳动局和团区委共同研究确定小队、中队干部名单后，已经编队的上海青年即开始进行训练，一开始主要是进行一次必要的纪律教育和沿途安全教育。要求青年在路上要互相友爱、关心，遵守纪律，保证沿途安全。同时还要进行参加新疆建设的伟大意义和历史责任的教育，鼓励大家做雷锋式的好青年。^[10]在训

[1]《共青团上海市委关于报名、审查、编队、出发等组织工作的意见》（1964年4月21日、4月13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21-1-1050。

[2]《关于设置街道报名站的通知（草稿）》（1964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21-1-1050。

[3]《共青团上海市委地区青年工作部关于社会青年政治审查中的一些问题》（1965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21-1-1095。

[4]《共青团上海市委地区部关于1963年动员知青参加新疆建设工作总结和宣传提纲》（1963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21-2-2266。

[5]《共青团上海市委关于报名、审查、编队、出发等组织工作的意见》（1964年4月21日、4月13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21-1-1050。

[6]《参加新疆建设的青年出发前训练工作的意见》（1964年5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21-2-2520。

[7]《杨浦区新疆招收工作组关于动员青年参加新疆建设工作的总结》（1963年12月8日），杨浦区档案馆藏，档案号47-4-84。

[8]《参加新疆建设的青年出发前训练工作的意见》（1964年5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21-2-2520。

[9]《护送干部工作任务与注意事项》（1966年6月15日），杨浦区档案馆藏，档案号47-4-132。

[10]《杨浦区新疆招收工作组关于动员青年参加新疆建设工作的总结》（1963年12月8日），杨浦区档案馆藏，档案号47-4-84。

练工作中，各级团组织负主要责任。如1964年5月，上海团市委下发通知，要求由区团委统一向街道团委布置工作，以街道为主开展青年出发前的组织工作，加强旅途思想教育，开展必要的军事、文娱活动。对此，各级团委请区人武部派人指导行军训练，以便行军活动能够迅速、整齐、有秩序、有纪律。如有可能，区里还按照出发批数集中搞一次会操或会演。为活跃行军途中的文化生活，请区文化馆培训一些文娱积极分子，并排练些短小精干的文娱节目，以便在行军途中搞车厢演出。在青年出发前，各级团组织还开展行军“五好”（即政治思想好，行军纪律好，团结互助好，安全卫生好，艰苦节约好）积极分子和“五好”小队的评比活动，发动青年制订个人与小队的争取行军“五好”的计划。^[1]此外，还订立小队旅途公约，以保证旅途注意事项得到贯彻。^[2]

（三）日常管理：做好旅途工作。从上海到新疆，从东海之滨到大漠深处，需要跨过长江、黄河，要经过亚热带季风气候、温带季风气候，再到温带大陆性气候，漫长旅途需要做的工作很多。这就需要上海、新疆双方投入巨大的精力，其中，上海共青团在带队护送干部培养、沿途管理、生活照料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

据1963年进疆旅途情况反映，从上海到西安一般没有什么思想上的问题，但护送工作组也会组织大家读书、看报、讲故事或开展其他文娱活动，丰富旅途生活。当火车进入河西走廊后，窗外的景致与江南迥异，青年开始逐渐情绪不安。尤其是当火车过了玉门关之后，全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无比荒凉，青年的思想开始产生波动。一些青年产生思家情绪，以致哭哭啼啼，影响到旅途的纪律。^[3]同时，车厢

内还容易发生饮水供应不足的现象。对此，需要加强旅途的思想鼓动工作。这就要求带队干部发动党团员和中小队长、骨干分子开展相应的思想工作，组织青年以“五好”条件为内容进行检查对照，及时表扬行军中的好人好事。此外，还需要做好沿途的饮食、休息、卫生等工作，教育青年发扬团结互助友爱的精神。如车到兰州时，进行一次行军“五好”的小评，表现突出的个人发给光荣证书，突出的小队发给喜报。^[4]就这样，一路上青年工作不断得到加强，团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得到彰显，从而带动了整个队伍顺利进疆。

三、安置巩固

大批上海青年来到遥远的新疆，一开始实行三年供给制，三年期满定级实行工资制，其目的就是要让上海青年在这三年时间里有一个缓冲适应的过程。其实，上海青年进疆后不久就奔赴生产一线，大多很快就能胜任各类劳动。这与带队干部协同新疆当地干部做好安置工作有直接关系。不过，因为新疆与上海之间天然的差异，以及新疆的艰苦劳动，使一些青年产生情绪波动，这就要求上海方面做好相应的巩固工作。

（一）协助接收：帮助新疆做好安置工作。每批陪同上海青年进疆的带队护送干部带领青年来到新疆后，并没有马上返回上海，而是协助新疆各接收安置单位做好青年的接收安置工作。1963年，上海市带队护送干部徐海荣、王瑾玉两人护送上海青年来到新疆兵团农二师四团，两人在青年到团场后还协助做了大量工作。其中，徐海荣一直工作到当年10月18日才返沪。^[5]而在这些带队护送干部中，不少是从上海各级团组织中抽调出来的优秀干部。

与此同时，新疆各级接收安置单位在承接上海出发时的整体编制基础上，也在各批进

[1]《参加新疆建设的青年出发前训练工作的意见》（1964年5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21-2-2520。

[2]《共青团上海市委关于报名、审查、编队、出发等组织工作的意见》（1964年4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21-1-1050。

[3]《共青团上海市委地区部关于1963年动员知青参加新疆建设工作总结和宣传提纲》（1963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21-2-2266。

[4]《团上海市委办公室下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招生工作组的〈关于做好行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安排〉》（1964年5月15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21-2-2520。

[5]《农二师四团向上海检查团汇报材料》（1963年11月6日），第二师库尔勒垦区档案馆藏，档案号72-2。

疆青年中逐步建立健全党、团、俱乐部三大组织，这三大组织在后来的安置巩固工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1963年秋上海青年进疆的火车上，新疆兵团农二师塔里木二场就在上海青年中建立了党、团支部和俱乐部，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业余宣传队，演出各种文艺节目56个。^[1]从旅途到安置地，共青团组织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而保证了新疆对上海青年的接收安置。

(二) 培养干部：为新疆各安置单位输送大批团员骨干。当时新疆，尤其是新疆兵团的青年工作比较薄弱，需要上海为新疆培养一批青年团干部。因此，每年动员输送上海青年时，都会有一批青年团干部一同来到新疆。随着上海青年支援新疆工作的深入开展，一些在上海团系统工作的青年干部受到感召，也主动报名支援新疆。其中，原在上海市卢湾区团委宣传部工作的茅国生即于1964年报名前往新疆，时年27岁的他想法很简单，认为有这么大批的上海青年前往新疆，需要有做青年工作的团干部去做相应的工作。最终他以调干的方式与上海青年一道前往新疆。^[2]确实，新疆需要大量懂青年、熟悉青年工作的团干部，就连张浩波都差点被调往新疆^[3]，可见当时新疆对团干部的需求之大。为此，上海团市委为新疆输送了大量青年团干部，并注意对这些团干部做好培养工作。

为做好团干部的培养，上海团市委通过主题团课等形式对选拔的团干部进行培训，以提升其工作素养。1962—1963年，上海团市委为做好上海青年支援新疆工作，对团的干部、赴疆青年骨干等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培训，并举行了几次全市主题团课报告。^[4]可见，针对团员骨干的选拔、培养，上海从一开始就有比较明确的思路。此后，上海也一直注重这方面

工作的开展。1965年，在上海团校学习的480名青年，经过20几天的学习，绝大部分到新疆去的态度更加坚决。^[5]

(三) 赴疆慰问：为上海青年带去家乡的问候。长期以来，新疆的物资匮乏问题难以解决。对此，上海青年有非常深刻的体会。一些上海青年回忆，他们到新疆后最深刻的感触就是吃不饱肚子，因此，吃饱肚子成了急需解决的问题。再就是精神上的空虚，尤其是对家乡的无尽思念。1963年初安置在新疆兵团农二师塔里木一场的501名上海青年，其中不少人难以适应艰苦的生活，因此用编歌谣来描述新疆生活的艰苦：“新疆好，新疆好，新疆都是苇子草，吃的是萝卜汤，睡的是地铺床。”还有一些小队集体哭鼻子，开始一个人哭，大家去安慰劝解，一提到上海如何好，爸爸妈妈的可爱，哭成一团。^[6]为此，1965年8月12日至11月13日，上海派出由时任副市长宋日昌带队，劳动、教育、文化、新闻、团委等部门组成的赴疆慰问团，开展了前后长达93天的赴疆慰问工作。^[7]一开始，上海市赴疆慰问团团团长准备由团市委书记张浩波担任，但因为上海市委认为新疆兵团，尤其是农一师的干部大多是老红军、老八路，去一个小伙子不行（张浩波时年37岁），故最终决定让上海市副市长宋日昌担任团长。^[8]

通过这次慰问，包括团市委在内的上海各单位，对新疆和在新疆工作的上海青年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据上海慰问团第一分团反映：“每到一个连队，大群大群的青年远远地就朝我们奔来，他们跑着跳着笑着，许多人都激动地流下了热泪，把我们团团地围住，这一个拉

[1] 《塔里木二场政治处关于安置和巩固上海青年工作的总结》（1964年4月24日），第二师库尔勒垦区档案馆藏，档案号40。

[2] 易海涛采访茅国生记录（2017年12月12日）。

[3] 林升宝、易海涛采访张浩波记录（2017年9月22日）。

[4] 《共青团上海市委地区部动员社会青年参加新疆建设时作的几次团课报告和学习辅导报告通知、会议记录》（1963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21-2-2264。

[5] 《新疆动员工作简况》（1965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21-1-1095。

[6] 《中国共青团塔一场委员会关于对上海青年安置巩固工作的汇报材料》（1964年4月21日），第二师库尔勒垦区档案馆藏，档案号40。

[7] 《1965年上海市各界赴新疆慰问团名单、领导讲话稿、慰问信及新疆建设兵团、师负责干部名单》（1965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27-1-884。

[8] 张浩波口述，林升宝、易海涛访谈：《到江西去、到新疆去——张浩波动员青年支援外地工作琐忆》，《青年学报》2018年第1期。

你到他们亲手盖的地窝子里去坐一会，那一个一定要你尝一尝他们亲手种的瓜果，这一边墙上贴满了青年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和体会，那一边演不完的文娱节目……”^[1]慰问团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上海青年的思乡之苦。与此同时，他们的到来还带来了相应的物质支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上海青年缺衣少物的困难。1965年11月6日，在上海市慰问团向新疆兵团汇报慰问情况的会议上，宋日昌开门见山提出：“兵团要上海支援什么？”^[2]同日，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书记处书记祁果在与宋日昌的谈话中明确请求上海要进一步为新疆提供相应的支援，除人之外还有技术、物资设备等支援。^[3]慰问团本身及其所带去的各类支援，对于新疆的发展、上海援疆青年工作的巩固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余论

上海青年1963—1966年支援新疆，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动员知青参加垦荒支边、上山下乡运动的重要组成。据统计，1955—1966年，上海共有16.4万名知青参加垦荒支边、上山下乡运动。有学者指出，上海之所以能够在此时掀起大规模的知青垦荒支边运动，特别是参与新疆兵团的建设，是同当时上海各级党组织深入细致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同广大青年的政治觉悟分不开的。^[4]确实，上海共青团组织上海青年支援新疆既是上海各级党组织工作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共青团组织知青上山下乡的一个缩影，从中可以看到，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共青团是如何根据青年特点来开展相关工作的。

[1]《一分团工作总结》（1965年11月8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21-2-2555。

[2]《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小楼向兵团汇报慰问工作的情况》（1965年11月6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21-2-2555。

[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书记处书记祁果同志同宋日昌同志谈话纪要》（1965年11月6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21-2-2556。

[4]吉景峰：《上海知识青年的垦荒支边活动》，徐建刚主编：《艰难探索：1956—1965》，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470页。

从上海青年支援新疆来看，共青团之所以能顺利完成任务，此前所积累的青年工作经验是其成功的前提，严密的组织体系是成功的保证，对中央精神的融会贯通是其成功的关键。共青团在上海青年支援新疆的各个环节都未落下，在动员、输送、安置、巩固等所有环节都发挥了独特而关键的作用。

作为当时组织知青上山下乡制度机器上的重要一环，共青团与劳动、教育、交通、公安等部门协同开展工作，如果没有这些部门的密切配合，共青团的作用也不能发挥得这么淋漓尽致。同样，没有共青团的工作，整个工作也无从开展。在上述各部门的协同工作下，广大上海青年为新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肯定。以新疆兵团农一师为例，到1980年初，该师2万多名上海知青中，有1615人加入中国共产党，1279人担任各级领导工作。1985年7月24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该师大光棉毛纺织厂召开有上海知青代表参加的座谈会。他指出：“同志们支援边疆建设的方向是对的。你们为支援边疆、开发边疆贡献了力量，贡献了青春。这在历史上是要写一笔的。”会后，应上海知青要求，胡耀邦题词：“历史贡献与托木尔峰共存，新的业绩同塔里木河长流。”^[5]

总之，上海青年支援新疆的伟大事业之所以能顺利开展，并在新中国史上留下重要一页，与共青团坚持以青年工作为中心，扎实做好本职工作密不可分。这一点，对今天的共青团工作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文系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新疆人口工作与边疆长治久安”（21CDJ021）的阶段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当代中国史研究》编辑

（责任编辑：沈阳）

[5]严爱云主编：《峥嵘岁月：1949—1978》，第139页。